

20 年来对中国大学教学的体认

看一所大学的教学模式，便可预览未来人才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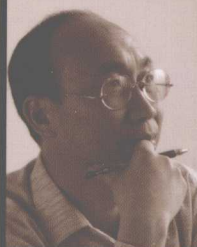
大学教学模式革新：

教学设计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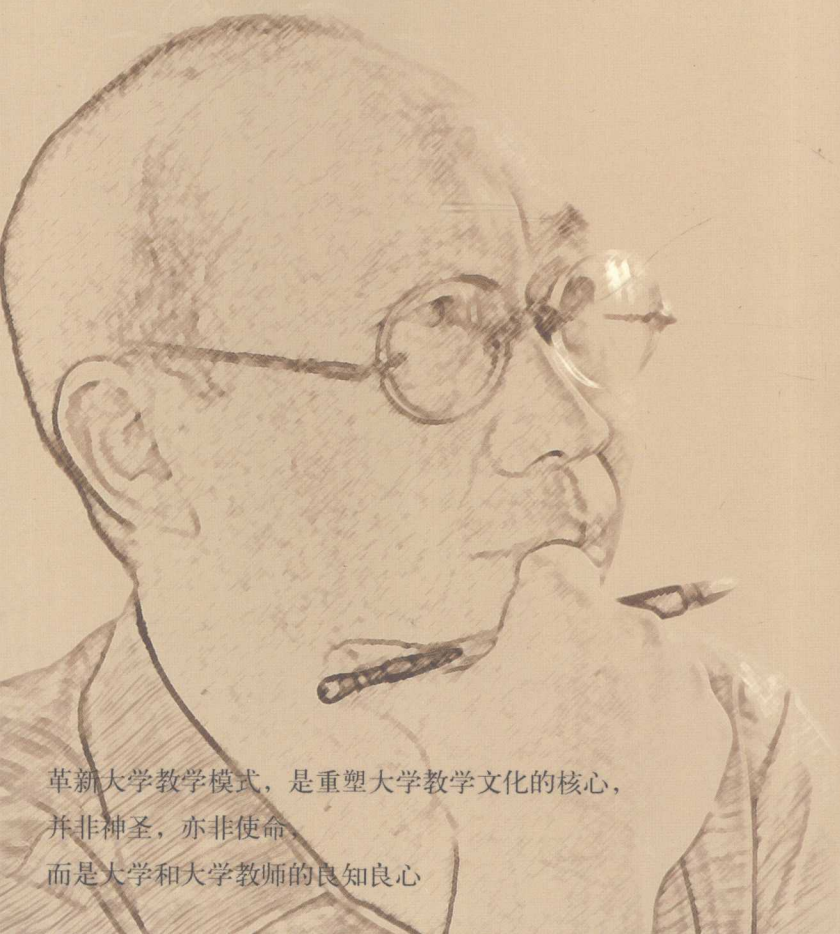
钟志贤 著

Innovating the Instructional Model in Higher Education:

A Perspectiv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教育科学出版社



革新大学教学模式，是重塑大学教学文化的核心，
并非神圣，亦非使命，
而是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良知良心

大学教学模式革新：

Innovating the Instructional Model in Higher Education:

A Perspectiv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教学设计视域

钟志贤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沈 燕 杨晓琳
版式设计 尹明好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教学模式革新: 教学设计视域 / 钟志贤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41 - 3897 - 2

I. 大… II. 钟… III. 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
IV. G642.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121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593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7.5 (另加插页)	印 数	1—4000 册
字 数	450 千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钟志贤，1964年8月生，籍贯江西瑞金。理学博士，1995年破格晋升正教授。现为江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技术学 /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江西师范大学一类岗教授，江西省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教学设计、信息化教育、素质教育与成功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完成省级以上各类研究项目10余项，获得省级以上各种奖项10余次。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主要代表作有：《素质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的使命》（1996，1998）；《远程教育导论——学与教的原理和方法》（2001）；《现代教育技术——促进多元智能发展》（2003，2005）；《面向知识时代的教学设计框架——促进学习者发展》（2006）；《点击成功》（2000）；《深呼吸：素质教育进行时》（2003，2004，2005，2007）；《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建构与实践例说》（2005，2007）等。

多部著作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多部著作被选为大学生、研究生教材和全国教师教育必读书籍。《素质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的使命》获文化教育类优秀畅销书奖（中国书刊协会，2000）；《深呼吸：素质教育进行时》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图书（2005），入选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主办的“知识工程”图书（2005）；《点击成功》被新世纪教育文库（2002）列为当代大学生100种必读书之一。被学术界称为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领军人物”，被专业网站评议为对中国教育技术学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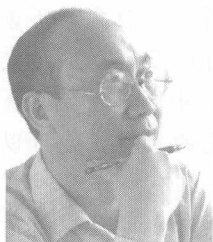
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大学教学模式直接影响大学教学质量。一种教学模式就是一种教学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培育什么样的人。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创新大学教学模式提供一种思考角度和行动方式。

本书从审视知识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通过研究国际上的一系列关于21世纪的能力需求报告，从多个角度描述了21世纪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以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为思维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十大局限，论述了改革的十大走向。

以21世纪人才素质的新要求为参照，针对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局限，根据大学教学模式改革的走向，以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为轴心，本书分别论述了教学模式的观念、类型、价值判断与变革取向，描述了教学模式变革的十大预期特点，并从教学设计的角度建构了革新大学教学模式的“行动地图”。在教学设计视域下，围绕革新大学教学模式的关键问题，分别讨论了大学教学模式革新的首要问题（理论基础、追求宗旨和目标倾向），论述了学习方式的变革走向和有效教学原则，探讨了“回归教学主体”的关键要义，描述了现代教学评价理念与方法，并从国际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视角，为革新大学教学模式提供了12种参考模式、方案或路径。同时，为了印证大学教学模式革新的理论框架，说明大学教学模式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推进大学教学模式革新的实践操作和实证研究，本书还提供了一个关于认知学徒制视野下的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研究的实证案例。

本书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实践性和可读性强的特点，可直接作为高校教学改革指导、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用书，适用于教师教育类专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和教育技术学等专业的研究生研习，也适用于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类、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阅读参考。

· 自 序 ·



大学，我怎么爱你

写就本书初稿，正值严寒，风饕雪虐，内心无比渴望春暖花开的景致。新年的日历早已翻开，春节的气氛却是若有若无。此时，国家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拉开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的帷幕。

但必须声明的是，本书并非应景之作，我没有先见之明，也缺乏“和诗一首”的机巧和雅兴。这不过是一种偶然。在“教学质量工程”文件下达之前，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就提高大学教学质量问题做了整整五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研究个案就是我为之工作了20年的一所省属师范大学。引发这项研究的动因很简单：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这是一条简单朴素的道理。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是一种“本能”般的应答行为，完全没必要他人苦口婆心、三令五申或者“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循循善诱。因此，本书是一种自然的积淀。

追求育人质量，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色。然而，在名风利雨的裹挟和侵蚀下，这一本色却出现了斑驳和褪色，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在发生“育人质量”的危机，一点也不过分。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与中国大学育人质量相关的报章和网页，你就会讶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昔日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大学已变成了“千夫所指”，像一座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坍塌的圣殿。面对中国大学教育质量危机的种种病相，各种各样的批评犹如

“井喷”，许多专家学者更是忧心忡忡，甚至国家总理也深感不安。

就今日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来说，培养质量首当其冲，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05年8月15日，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的唯一华裔得主、国际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他坦率地指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大迫切问题，就是提高质量，改正学风。“中国学生的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深感忧虑地呼吁：如果不重视学风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作为目前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丘成桐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而且十分关注国内数学人才的培养。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近年来频繁接触国内大学及大学生，对于两国高等院校的差距，丘成桐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的一番话引人深思：这些年，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比美国差。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高。美国的大学教育比中国好得多，研究生教育比中国好得更多。比如，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每年大约招收20名念理科的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来自北大这些名校，但很难看出他们的学习成绩比其他国籍的学生好很多。丘成桐认为，这些现象都表明，是本科出了问题，“做学问的修养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而且还不用功。归根结底是本科教育不扎实”。

2006年7月12—1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出了许多批判中国大学教育的惊人之语。

没有创造性，何谈创新？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直言：近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大学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创新人才的？它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扼杀学生创新能力的问题？大学怎样才能给学生一个创新能力再生的空间？目前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是先把青年学生的创造性扼杀完了，然后又要他们去创新，那怎么创造得出来呢？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也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青年学生，都没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与过去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方式有关。教育管理部门、教育者本身都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学的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没有制度的改革，就会束缚思想的创新、观念的创新。

我们的大学教育会不会把人培养得像机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现在的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一个小老头，没有童真，没有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训练成这样的。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考大学，功利化的因素使他们对其他事情丧失了兴趣。

大学学术造假会毁了整个民族。朱清时批评指出，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中国大学的学术风气已经下降到最低点了。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出在功利主义、浮躁上。我们做学术的，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宽松的氛围，但是现在教授们整天忙于应付各种评估、考核、会议。我们非常希望学术界能够“予民休息”两三年，不评估，不开任何会，让我们能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论坛上还有许多针对当前中国大学教育的“当头棒喝”。应当说，这些校长们深知今日大学教育的“个中三昧”，对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直指症结，深中肯綮。

中国大学教育的培养质量问题，甚至牵动了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2006年1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和6位大学校长座谈时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两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

校长和专家们围绕总理的问题畅所欲言，开出了许多药方。王大中认为，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谈松华认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大学开始，就太晚了，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研究型大学要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杨福家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周远清认为，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高教战线要聚精会神、理直气壮地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要严格教学秩序和内部管理，加大教学投入，改变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纪宝成认为，高校要从外延扩展转移到内涵提高的轨道上来，建议实行“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宏观入手、微观发力，稳步推进“211工程”和“985工程”，积极

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形成多样化、分类型、分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

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在三个小时的座谈会上，面对有备而来的专家，面对一个个精彩发言，主持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始终神情专注，认真倾听。温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高校班级人数是要少一点。导师和学生要经常见面，才能真正发挥指导作用。但现在有的学生读几年书，和教授都说不上几句话。”这番话听来很实在，很亲切，很温情，也很发人深思。

校长和专家们的建议固然有助于疗救大学教育质量的危机，但是关于大学如何培养“大师”级的杰出人才，更多的学者认为，学术环境和教育体制问题是无法绕过去的。环境对于人才的培养很重要，对于培养大师来说，更是如此。一个理想的学术环境，首要推崇的是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师的思维方法或行为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它需要包容的学术环境。早期的北大之所以人才辈出、大师云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秉承了“兼容并包”“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办学理念。然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还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甚至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禁区。这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即使是天才，在强大的惰性力量面前也难以大放异彩。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尤为明显。此外，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官本位”侵害了健康的学术环境，领导似乎可以成为当然的学术权威，学术水平的高低仿佛可与职位高低相挂钩，进而产生科研项目暗箱操作、学术研究层层转包等现象，结果必然导致科学研究变质。“官本位”现象还令很多教师想方设法去当官，然后或陶醉于权力而放弃研究，或事务缠身而无法潜心研究。在这样的环境中，纵有天才之料，也难以雕琢成器。

有学者认为，要提高大学培养质量，今日的中国大学必须超越“做什么都是一个模式”的从众行为模式。有人将这“一个模式”概括为三个“胡同”：一是所有的学校都在“申硕”“冲博”，不切实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许多硕士、博士的培养水平在下降；二是所有的学校都在用科研成果来考核教师，用论文数来激励教师工作，却忽视了高等院校应当有一流的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三是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都向热门专业扎堆，造成人才培养的盲目性。如果中国的大学教育一直在这三个“胡同”里游荡，将很难培养出大批实用型人才，杰出人才也很难脱颖而出。

还有学者指出，国家对重点大学不能只讲投入不讲回报。投入是必须的，但前提是要清楚地知道投入所要实现的目标，所要产生的结果。重点大学不能只依靠政府“喂奶”，还要有本事向社会筹集资金。大学如果向企业争取资金，企业必然要求有成果回报。国家的投入也应该如此，要把

办学的最终回报作为投入的目标。此外，杰出人才的培养还在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能各就各位，各种不同层次、门类齐全的人才培养将推动金字塔尖人才的培养。如同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总结的那样，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应该由学校负责，各有特色。

的确，面对今日大学教育的培养质量危机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支支吾吾或冠冕堂皇地搪塞，只有接受良知和良心的拷问。透过各种媒体，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大学教育的几大弊端、几大缺失，甚至是几宗罪之类的标题，尽管这些言论有些刺目扎耳，也难免隔靴搔痒或以偏概全，但它们却真切地流溢出对大学教育的某种担忧和急切。在20年的大学教学经历中我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大学教育的确存在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愈演愈烈。这里，我可以信手拈来几条。

我们把学生当回事了吗？“以学生为本”是许多大学的宣言，然而在实际中有些学校却并非如此。比如，在大学教学管理运行体系中，作为消费者的学生，从来都是弱势群体；学什么，怎么学，为何学，什么时候学等一系列关涉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从来都是大学一方说了算。就好像你跟随一个旅行团出游，走到哪里都是“包餐制”，只要凑满了数，管你什么花样和质量。“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在这里行不通。就大学与大学生的利益关系来看，大学是这个世界上“超级霸王条款”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在市场买了个伪劣产品，还可以有许多方式去与商家理论，但在大学里接受了伪劣教育，又能找谁理论去？买伪劣产品最多损失的是几个铜板，而接受伪劣的大学教育，损失的不仅是铜板，还有无价的青春。

我们有大学培养目标设计标准吗？众所周知，培养目标是一种很重要、很规范的教育教学标准，但在国内大学，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培养目标案例，很多学校制订的培养目标毫无时代性、个性和操作性。而同样是培养目标，在一些国外大学就要有章法得多。

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本科生培养目标设计上，详细地列出了12项标准：（1）具有清楚的思维、表达和写作的能力；（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7）具有判断什么意味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8）具有辨识重要的东西与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的能力；（9）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10）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11）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12）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一目了然，这些标准中包括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今日时代所珍视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

学习能力。这种详细的本科生培养目标设计标准，不仅使得教师知晓该教什么，怎么教，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该学什么，怎么学。虽然我们的大学也在谈创新，可是如果创新不能具体体现到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之中，那么，“创新”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时髦的高调。

“满堂灌”是不变的教学风景。MIT 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讲了个故事：一位 19 世纪中叶的外科医生神奇地穿过时间隧道来到一间现代的手术室，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完全陌生的，他不认识任何手术器械，不知道怎样动手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得上忙。现代科技已经完全改变了外科医学的面貌。但是，另一位 19 世纪的教师也搭乘同一部时光机器来到了现代的教室，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除了课程内容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变动外，他可以立刻从他的同行那里接过教鞭。因为，今天的教学方式和 150 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许多专家不禁感喟：学校是过去 150 年来始终没有太大改变的地方。只要看看今日的大学教学实际，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故事是一种居心叵测的揶揄。教师是知识的灌输者，学生是接受灌输的“容器”，这种师生角色几乎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变化。大一统的班级教学、齐步走的教学进度、单一落后的教学技术、缺乏个性的教学方式，几乎是中国自有大学以来经久不变的景观。

尽管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在理论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功能齐全的教育信息技术条件也为师生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我们的大学教学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敢变，没有变。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除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为什么不能有自主、协作和探究的教学模式？除了班级教学，为什么不能有小组讨论或个别化？除了面对面的传授，为什么不能有跨时空的远程协作学习？教师除了作为讲坛上的圣人，是不是还可以作为引导者、帮促者、团队协作者、课程开发者、学术顾问、研究者和学习者？学生除了作为乖巧的知识接受者，是不是更应该成为主动探究、积极建构的学习者？我们的教学文化是不是更应该倡导学生学会在情境中学习、在反思中学习、在交流中学习和在协作中学习？不改变传统的“满堂灌”一统天下的教学模式，今日大学所宣称的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势必成为一种奢谈。

大多数教学依旧局限于低阶能力的培养。由于教学目标的错位、教学方式的滞后等因素使然，中国大学的大多数教学依旧在低阶能力、低阶学习和低阶思维的层次上游荡徘徊，难以有效促进学习者的高阶能力，特别是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如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等，也难以有效地塑造大学生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质。

我们知道，低阶能力是运用低阶思维解决简单问题或完成简单学习任务的心理特征，通常表现为机械的记忆、浅层次的理解和近迁移的应用能力等。低阶学习是指运用低阶思维进行机械的学习，通常是被动的、外在牵制的、接受的、抽象的和单独的。

局限于学习者低阶能力培养的教学是低层次的教学。从认知水平层次上看，它在教学目标、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上主要局限于低阶认知水平层次，如识记、理解和应用，忽视高阶认知水平层次，如分析、评价和创造等方面的发展。在这种教学中，教师最为典型的教学行为就是把知识制作成“丸子”或“液体”，把它们顺利地灌输给学生（只要能做到无痛灌输或快乐灌输就能成为教学能手或教学名师），学生的典型角色就是接受和复制教师的灌输（接受的多寡直接厘定学生的学业成绩水准）。在这种从A到B的传输过程中，学生所面临的认知能力挑战极其有限，所获得的知识是一种惰性知识（难以远迁移或举一反三）。久而久之，在习惯和麻木下，往好了说，学生被“教学”成为一种储存器、一张光盘、一个两脚书橱，或者被塑造成为一台精制的复印机。

高阶能力是以高阶思维为核心（创新思维、问题求解、决策制定、批判性思维）的解决复杂问题或完成复杂任务的心理特征。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在教学目标分类中通常表现为较高认知水平层次的能力，如分析、评价、创造。高阶学习是指运用高阶思维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它通常是主动的、建构的、反思的、真实的和合作的。根据目前的研究，高阶能力主要包括十大能力：创新、问题求解、决策、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团队协作、兼容、获取隐性知识、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日益要求教育机构重视培养学习者的高阶能力。

批判性思维是高阶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与其他高阶能力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也是为时代社会和个人发展所珍视的重要素质之一。耶鲁大学校长莱文（R. Lewin）认为，在未来15~20年中，要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上升，避免遭遇到类似日本遇到的问题，就必须更新教育模式，重视和开始对大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04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指出：“为什么我们的某些研究生在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时比较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批判性思维这一理念。”美国批判性思维研究专家保罗和埃尔德（R. Paul, L. Elder）说，一位教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有限的，这些知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被逐渐淘汰。那么教学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教授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宽阔的胸襟，既不自卑也不自大，谦虚、谨慎地看待自己和他

人，同时保持好奇、质疑的态度。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达到人们常说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教授们不再是永不犯错误、不应该被质疑、挑战的权威，学生真正从对教授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如此的重要，但时下大学教学的现状却很自然地使我们疑惑：体现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教学目标在哪里？支撑学习者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教学模式又在哪里？

多媒体教学成了“口灌”的翻版和写意。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大学的信息化教育条件日臻完善。然而，由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滞后，信息技术却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作为教学工具方面，绝大多数的信息技术仍在扮演教学辅助手段的角色，主要充当教师新型“满堂灌”的教学效能工具。拿部分大学多媒体课堂教学来说，所谓的多媒体课件多数是“黑板搬家”，昔日教师的板书变成了一张张密密麻麻的PPT；多数多媒体课件缺乏恰当的音频和视频，多媒体可怜地变成了单媒体；昔日教师的“照本宣科”变成了“照片宣科”，PPT成了一本放大的教科书；昔日教师的“口灌”变成了“电灌”，“灌”得学生头晕眼花，学生原本应有的思维空间和思维火花，被冷漠地屏蔽和剿灭。此情此景，计算机与其说是教师的一个演示和播放工具，不如说是一个便利的写字板和超级“注射器”。在一些高校，多媒体教学被弄得声名狼藉，加上有些教师因循守旧和缺乏基本信息素养，多媒体教学被揶揄为花拳绣腿和花里胡哨。的确，缺乏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支撑，不能有机地与学科课程相融合，多媒体教学技术或其他信息技术很可能成为一堆高档的教学装饰物，抑或成为“教学秀”的一种道具。

在作为学习工具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状况更是让人担忧。多数学习者仅仅把信息技术看做是一种能快乐地复制和粘贴“学习成果”的“魔杖”。在轻快的技术操作中，不仅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缺席，而且消弭了“抄袭和剽窃”的罪恶感，起码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在操作的快感中不知不觉地沦丧。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学习者，主要的责任在于学校和教师，根本的症结在于缺乏支撑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教学模式。

信息技术要作为学习者有效的学习工具，需要给学习者呈现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学习者投入高阶能力特别是高阶思维能力，如比较、鉴别、分类、归纳、分析、推论、证明、概括和阐明主见，等等，需要引导和培养学习者把信息技术作为信息工具、情境工具、交流工具、认知工具、评价工具和知识建构工具，把信息技术作为智能伙伴，使信息技术支持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有效地成为思维发展的参与者和帮助者。显然，这需要教师去设计、开发或运用新型的教学模式，如 WebQuest、MiniQuest、Thi-

nkQuest、CLCS、e-Portfolio（电子学档），等等。然而，对于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研究与实践，目前在我们的大学教学中还是付之阙如的。

其实，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对错，关键在于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如今，信息技术是涌入了大学校园，但是如何使之产生最大的教与学的效益，前面的路却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因为传统往往是一种习惯，面对挑战，容易以坚守的名义而因循守旧和心安理得。然而，当大刀和枪炮相遇的时候，传统的东西再好，该变的时候还是要变。同样，武器装备变了，战略思想和战术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甚至更要成为统摄新型武器装备的指导。

大学的脾气很大。审视我们今天的大学，我们不得不正视：长期浸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大学，养成了一种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坏习气。比如，一场再平常不过的高等教育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就会招来种种所谓的质疑、批评，乃至讽刺、挖苦、嘲笑甚至谩骂。我是一个有20年高校教龄的大学教师，要说我很明白评估，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只是想问：评估怎么了？在一个各行各业都讲究绩效的时代，为什么大学就要例外，就能例外？至于如何评估，大家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量。又比如，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教育信息化……当基础教育各种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学教育却依旧是睡眼惺忪，懒散地躺在象牙塔的象牙床上“隔岸观火”。稍微对比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学教学的改革远不如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来得那么开放、自然和实在。

大学教育研究现象很奇怪。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前辈曾在许多场合说过，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照我的理解，说不研究自己，一是不重视研究高等教育教学问题，二是不研究大学自身的教育教学问题。这种“舍近求远，避亲就疏”是中国大学教育研究中的一种奇怪现象。

一位大学校长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学校有许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说起国外大学教育头头是道，对自身的大学教育却隔靴搔痒，这样做研究有点儿不合情理吧？我想可能的回答是“画鬼容易画人难”。大学教育研究居然不研究自己，难道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问题的关键远不在这里，而在于这种研究缺乏本土问题意识和校本研究意识，是一种“现实具体对象缺席”的文字游戏，根本无法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或创造特色。

是不是一只被阉的猫？曾经收到一位经济学博导发来的短信：一只公猫引来一群雌猫，整日聒噪不休，主人怒而将公猫阉之。可没几天，这只公猫又开始和雌猫们嬉戏。见主人疑惑，公猫莞尔：不让做业务，还不能教教课吗？信息的关键在于后一句话：“莞尔”是一种怎样的神情？“不让做业务，还不能教教课”又是一种怎样的寓意？我怀疑这是哪个家伙

特地创意出来讽刺大学教育和大学教师的。让我们做个不大愉快的联想：在大学里，如果一个教广告的教师却不具备广告策划能力，一个教市场营销的教师却完不成一例像样的营销方案，一个教写作的教师却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诸如此类的教师，居然还敢站在大学讲台上，你觉得他能行吗？

行与不行，关键在于大学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其时下的状况实在让人揪心。这既与大学教师来源的先天不足有关，也与教师的认识和态度有关。想当年，为了提升专业实践能力，我硬着头皮兼任了两家“双效期刊”的专栏作者，目的不是为了什么稿费，而是想锻炼自己的实战能力，亲身体会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体验“学而时习之”的意义。因为我小时候就被父母教育：“纸上谈兵”，害人害己；街亭一失，不仅马谩成为历史的笑柄，而且殃及无辜，破坏“国家大计”，所以，诸葛亮挥泪斩掉了马谩，也表明了对这种人才的鄙弃。由于长期以来“重知轻行”的教育使然，许多大学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求。但问题还不在于能力的高低，更在于其态度。能力低，胆子大，自我感觉良好，才是要命的。知困而学，知不足而弥补，和知错能改一样，都是属于善莫大焉。

上述关于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是我个人的即时随想，每每提到这个话题，各种感想就犹如“井喷”，让我的脑力难以招架。就我个人的大学工作经历来看，批评是容易的，破坏性的批评甚至还有某种宣泄的快感，但要真正拿捏问题的实质，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并且转化为具体行动，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审视和解决问题而言，我不太喜欢面面俱到或轻描淡写——面面俱到好像是“张口吞天，无从下口”，轻描淡写更像是一张漫漶的照片，可以随便联想，就是无法确定它究竟是怎么个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肤浅的全面还不如片面的深刻。浓墨重彩更能使我们的视觉聚焦，形成难以颠覆的印象。也正因如此，讨论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特别是培养质量问题，我选择把重心放在大学教学模式上，从教学设计的视角来考察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考察大学教学模式的发展走向，并且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探寻革新中国大学教学模式的理论指导和行动路径。

本书的运思方式是“知行合一”，即将“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做”三者统整起来思考，从教学设计的角度，为革新大学教学模式提供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框架。第一，以知识时代为背景，审视了21世纪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第二，以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为思维框架，考察了今日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十大突出问题，把握了当前大学教学模式改革的十大发展走向；第三，认识了教学模式的基本概念及其改革发展的十大预期特点，把握了教学设计的基本观念，以时代为参照，针对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

题及其改革走向，从教学设计的角度建构了革新大学教学模式的“行动地图”；第四，在“行动地图”的指导下，确定了革新大学教学模式的“行动路径”，并以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为着力点，论述了如何实施大学教学模式革新；第五，从国际教学模式发展的角度，为大学教学模式革新提供了十二种行动样例；第六，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为大学教学模式革新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说明大学教学模式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印证了本书的革新框架。

总括起来，选择大学教学模式作为革新的对象，以提高大学的育人质量，理由有二。

其一，它很重要。大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与教学模式相关。一种教学模式就是一种教学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必定孕育和滋养什么样的人。比如，一种教学模式根本没有“实践”的元素，要想运用它来促进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或问道于盲。长期以来，宰制我们大学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灌输式的，可谓百年不变。

其二，它可以做。教学模式最具有教学生活性和操作性。每个大学教师，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论教什么科目，只要上课就必然要运用到某种教学模式；只要愿意，就有可能去探索更为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这种生活性决定了教学模式与教师的普遍关联性和亲同感，也更具备实践操作性。这比起其他大而无当或远水解近渴的改革方案来说，显然要直接和务实得多。今天的中国大学教学改革现状，很多时候迫使我们相信“树上的金凤凰不如手中的花生米”，“与其梦想天边的一座玫瑰园，不如用心欣赏今天就绽放在窗台上的玫瑰”。如果说我是鼠目寸光或井底之蛙，我不会同意，我想只要你稍有现实常识，就会理解什么叫在特定情景下务实的思维抉择。

写到这里，我的思维突然产生超级链接，似乎看到仰望着长江边上神女峰的舒婷，一个象征一代文化符号的朦胧诗人，突然把挥舞的花手帕收回，紧紧地捂住自己的眼睛，在人们四散离去的时候，还站在船尾，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随着高一声低一声的江涛滚滚，吟出了一首朦胧而又清晰的诗：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为盼望远天的杏鹤/而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20年前读的这首诗，今天竟然还记忆犹新，不能不说这首诗对某种传统的颠覆给我心灵留下的震撼是何其久远。与其终日展望未来或追悔过去，不如实实在在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与其终日幻想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整治一个花园，可以从拔除一根杂草开始。同样，改革大学教学弊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可以从革新教学模式的某个要素开始。只有当大学教学改革成为每个教师都可为、都能为的时候，它才可能“着床”和落地，才可能萌动和焕发生命力，

否则它只能存在于传达的文件和高呼的口号中。同样，缺乏大学教师参与的大学教学改革，发生“上面热热闹闹，下面冷冷清清”，“隔岸观火”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说到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隐忧，“哀其不幸”的感伤是有的，“怒其不争”的苛求是没有的，因为我深知我们的大学的处境。我爱我们的大学，我不会梦想我们的大学在某一天突然脱胎换骨，我只想一点一滴地为受伤的大学疗伤，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为大学的进步做点什么。爱可以很简单，简单到一句温情的问候，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昏黄的路灯下，独自想念的身影也会写满无尽的深情。对于爱一所大学来说，何尝不能如此？

请原谅，我不能把本书写得更通俗一些，但我尽量做到文字通畅。这并非是我不会写，而是我不能那样写，因为我好歹还顶着个教授和博士的头衔，要是我写出来的文字连引车贩浆之流也能朗朗上口，恐怕要被学问家们指责缺少文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害大学教师的自尊心。学问家和大学教师一般很讲究专业话语和学术性，但我认为这是个学术毛病，对此，我做了一些改进，但做得还很不够。“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说来真是惭愧，想当年大诗人如白居易者，每写就一首诗，就要到老婆婆面前读一读，如果老婆婆听不懂的话，白先生马上就“择其善者”，把它改得通俗一些。所以，他的《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等名作能穿越时空，流传至今。

说句实话，虽然本人在学术界混了大半辈子，写学术著作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但我本人并不喜欢使用所谓的学术话语或形式来表达自己，总觉得学术话语是一套僵硬得让人敬而远之的“制服”。有些正襟危坐者还能残存几分庄严，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一副装腔作势的面孔，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还要振振有词。从硕士到博士，我读过许多教育研究类的文章，就其表述形式来说，鲜有能让我如沐春风、激情澎湃或澄明透彻者，总体感觉是味同嚼蜡，仿佛面前端坐着一个老气横秋、暮气沉沉的账房先生。董桥说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济济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

我始终难以明白，教育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为何许多教育研究类的文章却缺乏“灵气”“朝气”和“人味”？这类有病的笔法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给你看。例一，把“这是一堆萝卜”写成“这是一堆由多个萝卜要素组成的、有一定结构的、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生突变效果的萝卜整体”；例二，把“闻花很香”写成“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的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照产生生理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对此，我